

斗争实践铸就红岩精神

□ 马奇柯

1939年1月16日，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为加强党对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周恩来为书记。作为中央派驻重庆的秘密机构，南方局领导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组织开展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新中国成立作出了重大历史性贡献。其间培育形成的伟大红岩精神，是我们党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南方局领导下的地区远离党中央，远离八路军主力，而且国民党当局控制严密，日军、伪军势力强大，工作环境险恶，敌情错综复杂。共产党人以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驾驭局势，化危为机，转危为安，夺取胜利。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濒临破裂，周恩来处乱不惊，奋笔疾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寥寥25字，却将事变真相巧妙大白于天下。其高超娴熟的斗争艺术，令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亦为之赞赏。之后党中央数次电示周恩来“迅即回延”，周恩来等冷静分析，鉴于向国民党顽固势力展开政治进攻的需要，决心坚守阵地，争取时局好转，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终获党中央同意，并最终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为了国家前途和人民利益，以“弥天大勇”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在43天的重庆谈判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底线思维，处处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同时灵活应变，适当作出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通过国内外舆论联动、情报统战互动、军事政治配合，中国共产党在这场非对称谈判中，迫使国民党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各民主党派中扩大了影响。

“出淤泥不染”的政治品格。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是做好国统区工作的重要前提和坚强保障。“出淤泥不染”的政治品格是蕴含于红岩精神中极具品格魅力和道德特质的精神光彩。在国共谈判中，针对蒋介石提出的把

共产党纳入“一个大党”的“溶共”企图，周恩来严正指出，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坚决保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

在群众工作上，南方局根据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和国统区实际情况，要求党员要实行“三勤”（勤业、勤学、勤交朋友）和“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当时的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就职于重庆税务局，组织部秘书荣高棠在电力公司工作，更多的党员则深入城乡，扎根群众，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密切联系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和服务群众。

在作风上，则是在国统区这个“染缸”中经受住灯红酒绿的考验。1940年，上海广大华行的卢绪章秘密接受周恩来指示，为党筹集经费。此后他忍辱负重、不计个人得失，为党筹措了多少经费，已无法准确统计，仅在1949年与华润公司合并时，就一次上交资金200万美元以及广大华行的全部资产。但谁也没想到，这位出入豪门、挥金如土的“大富豪”，贴身衬衣却打着补丁。当年，战斗在国统区这一特殊环境中的共产党人，无论是钱之光、潘梓年等身在红岩，还是沈安娜、黎强等深入虎穴，或是卢绪章、肖林等屡战商海，他们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本色，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在国统区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是蕴含于红岩精神内聚力的生动体现。

周恩来经常告诫，应该在千军万马中敢于与人家来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泛的人们一道斗争。他自己甚至同有过“宿怨”的原国民党中统总干事张冲“由公谊而增友谊”，在两党合作中“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留下了一段“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佳话。南方局经济组组长许涤新，主要从事对经济实业界的统战工作。由于国民党的造谣诬蔑，许多资本家对中共有很深的隔膜。在遭受了无数次的白眼、冷落和敌意的“送客”，他仍坚毅地一次又一次递进名片，慢慢取得较开明资本家的信任，建立起了友谊，从而深入重庆工商界，团结了一大批民族资本家。

以周恩来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还放眼世界，广交朋友，连起了中国共产党与国际社会沟通的桥梁。其中周恩来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的交往和友谊最是脍炙人口。1942年初卡尔大使离任时，《新华日报》连发三文为其送行。临别登机时，卡尔高举周恩来赠给他的共产党军队缴获的日军战刀，预言周恩来和他代表的政党最终将在中国获胜。

善处逆境、临难不苟的英雄气概。在国统区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善处逆境、临难不苟的英雄气概是红岩精神的真实写照。周恩来就是这一方面的表率。1940年，面对日机对重庆的又一轮狂轰滥炸，他站到被震坏的八路军办事处大楼前，坚定地对大家表示，日寇企图用轰炸来摧毁我们的抗战意志，迫使我们屈服投降，但我们是炸不走的。并特意和邓颖超在震坏的墙壁前合影留念，以示决心。皖南事变后，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捕、杀、讨、扣”，周恩来更是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庄严宣告，要作最坏的准备，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起牺牲。

南方局领导、培育和影响下的广大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同样秉持“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成为红岩精神的坚守者。1940年3月，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被捕后，拒绝国民党高官厚禄等诱惑，给党写下“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的最后留言，从容就义。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在狱中铮铮铁骨，牺牲前慷慨表示“热血似潮水的奔腾，心志似铁石的坚贞，我只要一息尚存，誓为保卫真理而抗争”。还有重庆解放前夕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以许晓轩、江竹筠、王朴、陈然等为代表的革命英烈，临难毋苟免，以身殉真理，用热血和生命实践和诠释了伟大的红岩精神。

同志一进门就与陈老师热情握手，并示意他请坐，然后打开笔记本听他开讲：陈老师讲课经验丰富，他的“开场白”是：“我没写讲稿，没带一个字的书面材料。可以根据您的需求，随时调整，也可以是讨论式的，您提问，我尽自己所能回答。”习近平同志当即表示就按他事先考虑的方案讲。陈老师从做好行政领导工作的角度介绍了西方哲学及其文化背景、所应把握的基本线索、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当今学者们所持的基本观点。在讲述希腊哲学和希腊文化时，他结合自己的研究，纠正了“西方中心论”的错误观念，并重点介绍了《野蛮的欧洲：公元前九世纪至公元后800年》这本书。说到这里时，习近平同志插话与陈老师交流荷马史诗中说的特洛伊城。当讲到西方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现代西方哲学时，陈老师提到现在高校政治理论课存在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教师受教学大纲束缚，围着基本概念、原理和运用题转；另一个是不少教师缺乏哲学史的观念、缺乏文化史和新兴学科的知识。这时张浚生同志插话道：“现在学校的政治课确实是个问题，学生不爱听。”习近平同志点头表示：“这个问题要研究。”陈老师是福建龙岩人，他的福建“普通

为全国胜利提供可靠的战略后方基地

——东北解放纪念碑碑文敬读

□ 李 波

在纪念东北解放40周年之际，沈阳市和平广场矗立起一座庄严的历史纪念碑，中共中央东北局首任书记彭真题写了碑名：“东北解放纪念碑”。

东北解放纪念碑堪称思想内容和造型艺术完美结合的佳作。苍松、翠柏，蓝天、白云映衬下的纪念碑，高大、雄伟、庄严，令人肃然起敬。纪念碑的设计别具匠心，三角亭式碑形表达了强烈的时空感，40只展翅飞翔的鸽子浮雕烘托着主碑下部的英文字母“V”（胜利），主碑外侧是顶部相连向下呈三角形环绕主碑的三条拱带，整体设计意喻欢庆战争胜利与珍视和平生活，同时也饱含了东北人民对革命英烈的无限缅怀之情。碑文全文如下：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调动大批军队进攻东北解放区，妄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统治全东北。是时，中共中央东北局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广泛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大力开展剿匪锄奸反霸斗争，创建民主政权，建立了根据地，壮大了人民革命力量。面对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制定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不断地组织自卫反击，继四平保卫战之后，又于一九四六年底发起“四保临江，三下江南”作战，粉碎了东北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一九四七年五月，我军展开夏季攻势，使东北战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九月至翌年三月，东北我军转入战略进攻，连续举行秋冬季攻势，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将敌人压缩于锦州、沈阳、长春三个孤立地区。在此期间，解放区的土改和支援前线运动深入开展，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空前高涨。东北我军在战略上处于绝对优势，遂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关于夺取锦州，将敌军封闭在东北境内各个歼灭的指示，发起了辽沈战役。经过五十二天激战，至十一月二日，取得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辽沈、平津、淮海三个战役的第一个战役的伟大胜利，歼灭和争取起义、投诚、投降的国民党军共四十七万余人。东北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广大人民群众和关内各战场人民解放军的支援配合下，经过三年的浴血奋战，共歼灭敌军一百零六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使东北地区成为全国解放战争巩固的战略后方。东北野战军尚未休整即奉中央军委命令入关作战，从而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我军将士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前赴后继，英勇奋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各级党政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战支前，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丰功伟绩将永远铭记在后代人民心中。

为东北解放战争胜利而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
辽宁省人民政府
吉林省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沈阳市人民政府
建立于东北解放四十周年

东北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时3年，从1945年11月初开始，到1948年11月2日解放沈阳结束。东北解放战争不是一个局部问题，而是一个有关革命和反革命大决战的全局问题，它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使得中国革命根据地摆脱了长期被敌人包围的局面。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斗争，始终处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在战略上处于被动的地位。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的支持下到东北劫掠胜利果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面临着新的严峻的战争威胁。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剿匪、土改、建党、建政、扩军、发展生产等一系列工作的扎实开展，东北革命根据地建成并逐渐巩固，粉碎了敌人妄图夺取整个东北并实行南北包围的阴谋计划，从而使我军获得了一个改变中国革命根据地长期被敌人包围局面的战略支撑点。

东北革命斗争的深入开展，消灭了国民党大量的精锐部队，有力地配合了关内解放区作战，大大加速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历史进程。东北沦陷的14年间，国民党部队在东北无一兵一卒。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争夺东北，把大量美械化部队运往东北，这就在客观上减轻了关内解放区的压力，使我军获得6个月的休整时间用于开展练兵、减租和生产。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关内各解放区进行的自卫战争迫使国民党不能抽出更多的精锐部队到东北，东北解放区由此得到了休整部队和发动群众的时间。东北民主联军经过1947年开始的三季攻势，我主力部队已经发展到70余万人，在数量和质量上均超过了此时的国民党东北驻军。

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战略后方基地。东北的解放，是在关内解放区及兄弟部队的支援和配合下取得的，而且对于全国来说，还是局部的。由此，把建设新东北与解放全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东北干部群众的行动目标。东北野战军（1949年3月改称第四野战军）主力部队入关，同关内兄弟部队并肩作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战，先后发起了平津战役、衡宝战役（中南战役）、海南岛战役，从鏖战津门到解放天涯海角，为全国解放作出卓越贡献。同时，东北解放区继续承担第四野战军作战繁重的军事供应任务。他们克服了自身发展的困难，在关内解放区建立新的革命秩序过程中，给予了人力、财力、物力和战勤等多方面巨大的支援。

东北解放战争依托于东北革命根据地，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和广泛参与，人民战争的威力得以充分体现。1946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东北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东北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动群众。会后，1.2万名干部被派往东北各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暴风骤雨般地摧毁了不合理的旧制度，农民获得了政治上、经济上的翻身。由于土地改革运动的彻底完成，民众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根据地更加巩固，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了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1948年东北解放区参加战勤、支援战争的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据不完全统计，共计参加民工200余万人，担架14.9万余付，大车15.5万余台，马48.6万余匹。3年以后，“东北成了全国战略决战的突破口”。

（上接4版）他说，做好宗教工作，关键是要正确理解、全面把握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各级领导干部要懂宗教、抓宗教，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掌握宗教工作动态，认真指导和协调做好宗教工作。仅在杭州市，他就专门腾出整块时间带着我们专程走访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活动场所，与灵隐寺、抱朴道院的佛教、道教界人士交流，到省民宗委听取工作汇报。

习近平同志十分清楚，宗教与哲学有着密切而又复杂的联系。为了从认识层面深入了解宗教问题的长期性、群众性和复杂性，2004年春节后，习近平同志叫我们联系省委宣传部和浙江大学，约请两位学者深入讲解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时间各为两个小时左右。我们先后邀请了浙江大学西方哲学史学者陈村富老师和省社科院中国哲学史学者吴光同志。这两个单位的负责同志来请示事先是否要审稿，我们根据习近平同志指示答复：“不审稿，放开讲。”讲解时间安排在4月15日全省宗教工作会议之前。吴光同志因时间有冲突，当时没有安排上，陈村富老师约定在4月7日。

那天下午3点，习近平同志在省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厅听取了陈老师的介绍，时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浚生同志和我陪同。习近平

话”让同是福建籍的张浚生同志听起来也有些吃力，但习近平同志笑着表示听得懂。他给我们解释，过去他已经听过不少西方哲学史著作，对这些专业术语都很熟悉，加上他在福建工作生活17年多，接触过各地方言。在轻松愉快的交流中，原定两个小时的课程陈老师不知不觉讲了近两个半小时。事后，陈老师告诉我：“大凡开设过本科和研究生的课程的老师，凭借多年形成的职业本能，就能对听讲人的专注度、理解力、学问功底和特点，做出一定的判断。习书记这位‘特殊学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笔记比我们在校的研究生都勤快、认真。从他的落笔和表情，可以推测他不仅记要点，而且关注我提供的破除旧观念的新信息。”

虽然全省宗教工作会议前没能安排上听吴光同志的介绍，但习近平同志一直记挂着这件事，让省委办公厅联系，最后把讲课时间确定在6月6日。那天下午3点，吴光同志来到省委办公楼小会议室，重点介绍了两方面内容：一是中国哲学的定位、特色与时代性问题；二是“浙学”的内涵、当代定位及其现代价值。同时，吴光同志对浙江建设“文化大省”工作提出五点建议。习近平同志听得非常认真，边听边做笔记，偶尔插话交流，如老子讲的“治大

国若烹小鲜”这句话的多层含义，“以民为本”与“以人为本”的区别等等，还询问了省社科院公用房等问题。

这让我联想到，习近平同志对源远流长的浙江文化了如指掌。每到基层调研，总会不时与大家聊当地的人文掌故，一次他提起唐代义乌籍诗人骆宾王，还诙谐地给我们讲：“我说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其实奥妙就在丰厚的文化底蕴。”平时，他对南宋金华学派的吕祖谦、永嘉学派的叶适、永康学派的陈亮等“浙东学派”以及明清时期的思想家王阳明、黄宗羲等思想和著作也十分重视。他曾说，王阳明以后，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封建专制的剖析批判，是有清一代浙江学人理性自觉、思想解放、富有创新的最重要代表；而从章学诚的“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的思想，到马一浮的“默然不语，其声如雷”的箴言，则可以看作浙江学人反对空话、务实创新的一贯思想作风和学术宣言。2006年4月，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与余姚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黄宗羲民本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他还专门向会议组委会发出亲笔签名的贺信。

2006年初，我全职在浙江大学工作。三四月间，省委办公厅来联系，要求推荐一位老师

给习近平同志介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我们上报备选名单后确定为郁建兴老师。因习近平同志临时有重要安排而两次改期，最终定于7月13日下午两点，在省委办公楼小会议室听讲。郁老师讲完回来后，给我讲了当时的情况。他向习近平同志介绍了四部分内容：辩证法的起源、黑格尔辩证法、马克思辩证法、辩证法的当代价值。他先讲了辩证法的语言学起源和它的存在论起源，花了较大篇幅讲解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然后又介绍了当代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哲学家卢卡奇，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萨特，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主要创始人霍克海默以及第二代中坚人物哈贝马斯，还有美国当代思想家詹姆逊等对于辩证法的理解。郁老师讲了两个多小时，习近平同志又与他讨论了大约40分钟，并了解了当前国内介绍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现状。

时隔多年，参与过这三次小型学习交流会的同志都有一个共同感受：习近平同志平易近人、好学，对相关知识有长期的积累；学习交流前，都是“有备而来”，不仅听得格外认真，边听边记，而且还不时结合浙江实际和自己的思考，提出各类问题与他们探讨。种种情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记忆。